

#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 多边外交政策

庞 森

**【内容提要】** 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中国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 实行对外开放, 与各国开展互利合作。在多边外交方面, 中国支持加强联合国的地位, 主张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保护人权等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社会为化解热点冲突所做的努力, 逐步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 努力推动国际裁军与防扩散进程, 并严格履行各项国际义务。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争取实现互利共赢。在人权领域, 中国呼吁摒弃人权政治化倾向, 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人权。中国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是当今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中国; 改革开放; 多边外交; 联合国; 关系

**【作者简介】** 庞森,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北京 邮编: 1000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9550(2008) 11- 0033- 08

1978 年 12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给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带来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 与联合国的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各领域活动的情况, 对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多边外交政策发展变化进行探讨。

## 一 对外政策的两大转变

邓小平指出: “粉碎‘四人帮’以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 对外政策也有变化, 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sup>1</sup> 这两大转变奠定了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基础, 也带来了中国多边外交政策及与联合国关系的重大变化。

### (一) 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调整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

迁。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在世界各个地区角逐。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 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迫近。中国国内工作的重点是备战备荒, 立足于早打、大打。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联合第三世界、构筑反霸统一战线。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苏联不断向外扩张, 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 国力下降。美国自越南脱身后, 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 发展中国家壮大, 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观察及分析, 认为在较长时间内, 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看法。他指出, 国际局势趋于缓和, 和平与

<sup>1</sup> 邓小平: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26 页。

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sup>1</sup>

对国际形势看法的转变使中国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及外交政策的调整成为可能。

## (二) 对外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

改革开放进程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开辟了广阔前景。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sup>2</sup>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总体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力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实行对外开放，与各国开展互利合作。

在多边外交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中国视联合国为“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sup>3</su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认识联合国，对联合国作用的评价趋于客观，与联合国的合作出现快速进展。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1986年3月，中国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谈到多边外交问题。这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后对多边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全面的权威性阐述。他表示，中国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

## 二 积极稳妥的调整过程

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样，是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进行的。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深入

发展的进程，从政治、经济领域，逐步扩大到裁军、安全、防扩散、法律、人权等其他各个领域，这一进程包括四个阶段：(1)观察、了解、学习阶段；(2)阐述原则立场阶段；(3)加深参与、介入磋商、谈判、提出具体建议阶段；(4)在各个层面采取具体行动推动联合国有关目标落实的阶段。

### (一) 坚持原则立场，维护独立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中国坚持反对外国的侵略、占领，反对使用武力、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等问题上，中国同联合国多数成员国一起，推动联合国大会及有关机构多次通过决议，要求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要求苏联撤出阿富汗，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他们的命运。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包括与联合国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哪个集团，也不同哪个国家搞战略关系。”<sup>4</sup> 他还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sup>5</sup> 邓小平将这项政策高度概括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sup>6</sup>

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努力维持一个稳定的世界。2003年，中国反对安理会授权有关国家向伊拉克动武，主张在安理会框架内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伊拉克问题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除表明原则立场外，中国还积极参

<sup>1</sup>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209页。

<sup>2</sup>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页。

<sup>3</sup>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4日。

<sup>4</sup> 《人民日报》，1985年3月29日。

<sup>5</sup>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sup>6</sup>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

与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所做的努力,为化解冲突、防止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二)加入国际努力,化解热点冲突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冲突久拖不停,不仅危及国际石油供应,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战争开始后,联合国秘书长立即开始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斡旋,但没有收到成效。1987年初,秘书长邀请安理会主席以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简称“五常”)的大使进行会晤,就结束战争探讨办法。中国对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做出积极响应,本着“严守中立,积极促和”的基本方针参与了磋商。经过六个月的磋商,安理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历史性的第598号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一切军事行动,并立即把所有军队撤回国际承认的边界内。这项决议第一次采取了带有强制性的语言,是“五常”为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进行磋商的结果,它标志着安理会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开始进行协调与合作,也是中国调整多边外交政策的一个新尝试。

联合国第598号决议通过后,伊朗没有马上接受,美国要求对伊朗实行制裁。中国主张给伊朗一些考虑的时间,同时在联合国内外做了大量努力,多次向两伊双方进行劝说,阐述“和则两利,战则俱伤”的道理,并派遣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作为特使出访伊朗。1988年7月18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给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写信,正式声明伊朗接受第598号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宣读主席声明,宣布伊朗和伊拉克接受第598号决议,实行停火和直接谈判,八年之久的流血冲突终于获得和平解决。

在结束两伊战争的努力中,中国一方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的调停活动,一方面积极参与“五常”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努力。中国运用自己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与当事国及非常任理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的独特地位,对促使伊朗接受安理会决议、和平解决两伊冲突起到了促进作用。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为和平解决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外交行动。在出席当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

外长,就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交换意见。在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钱其琛指出,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湾危机,支持安理会发挥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中国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认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因此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

1990年11月,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与有关各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的行动受到各方面的欢迎,钱其琛是海湾危机期间“五常”中唯一的一位访问过伊拉克的外交部长(简称“外长”)。2003年2月,伊拉克战争迫在眉睫,安理会围绕战与和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美、英等国要求安理会通过暗含授权动武条款的新决议,中国力主在安理会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外长唐家璇在一个半月内四次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他表示:“只要有一分政治解决的希望,国际社会都应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sup>1</sup>

由于美国等国采取单边主义,把联合国抛在一边,伊拉克战争最终未能避免。这场战争给联合国的权威造成极大危害。战争爆发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重新回到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正确道路上来。

### (三)参与维和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重返联合国近十年里,中国对维和行动采取不参与、不投票、不摊款的立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政策做出调整。

在1981年召开的第36届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在发言中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促使冲突各方脱离接触、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今后凡是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的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于维护有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都将本着积极支持的

<sup>1</sup> 唐家璇:《在2003年2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伊拉克问题会议上的发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fywn/fy03/t40532.htm>。

立场,予以认真研究和对待。这标志着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立场的根本性转变。1981年12月,安理会审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期,中国对延长任期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自1982年起,中国开始承担对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费用的摊款。1982年12月,中国投票赞成增派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维和部队。

1988年9月,中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当年联大通过第43/59号决议,同意中国成为该特委会的成员。

1989年1月,中国决定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受到各方欢迎。此后,中国陆续向16项维和行动派出人员7000余人次,包括军队、警察、文职官员、工程连、运输大队和医疗分队,是“五常”中派出部队最多的国家。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支持逐渐增多。1998年8月,中国投资1.6亿元在河北省廊坊市建立了亚洲最大、功能先进、设备齐全的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以便为维和行动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 (四)积极推动裁军,防止扩散风险

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持批评态度变为逐步参与进而发展到积极推动并身体力行。中国主张全面彻底裁军,要求两个核大国率先大规模裁减军备,同时表示愿意承担自己的裁军义务。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不断攀升,联合国的裁军努力陷于困境。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2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严厉批评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联合国裁军进程,他指出:“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sup>1</sup>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于裁军问题的立场出现变化。1978年5月,中国派出以黄华外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第一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1979年,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次年2月,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发言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裁军问题的立场。他谈

到:中国决定从1980年起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愿抱积极的态度,同大家一道探讨问题,为促进裁减军备以有利于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1982年6月,联合国举行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率团与会。黄华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代表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指示,抱着真诚的意愿前来参加会议。我们愿意同与会各国代表一道,对当前有关世界裁军的重大问题认真的探讨,并希望会议能对促进裁军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sup>2</sup>中国在会上提出了裁军的目标、所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和四点主要措施,受到了与会国家的广泛重视。

1984年5月,中国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对于裁军问题的立场,“主张在两个核大国率先停止试验、改进、生产核武器并就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达成协议之后,召开包括所有核国家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讨论共同裁减核武器的问题。”<sup>3</sup>

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国际和平年的倡议,中国于1986年3月在北京召开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在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有关裁军问题的各项主张。1987年,中国作为东道国同联合国合作,在北京召开了世界裁军运动区域研讨会。

1986年12月,中国在联大就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提出两项提案,其中有关核裁军的提案敦促拥有最大核武库的美国和苏联履行它们对于核裁军担负的特殊责任,率先采取行动,停止军备竞赛,为早日达成大规模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进行认真谈判。提案也呼吁其他核武器国家在美苏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后参与核裁军的进程。另一项提案敦促两个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继续就裁减常规军备进行谈判,早日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就限制和逐步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达成协议。这两项提案均在大会获得通过。

<sup>1</sup> 《乔冠华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7日,参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688/。

<sup>2</sup> 第二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文件,第A/S-12/AC.1/23号,1982年6月21日。

<sup>3</sup> 赵紫阳:《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5月15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834.htm。

与此同时,中国不回避自己所应承担的裁军义务,在裁军和防扩散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主动行动。1988年5月,第三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召开。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率团与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裁减100万军队员额的措施。

在防止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承诺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起,中国忠实履行条约各项义务,致力于维护和加强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努力推进条约规定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推进核裁军进程、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等三大目标。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逐步建立起涵盖核、生物、化学、导弹等相关敏感物资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出口管制法规体系。中国参加了防扩散领域的所有国际条约和相关国际组织,与其他国家和有关多国出口控制机制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已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防扩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加磋商,提出建设性建议。中国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要求,从立法、执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为防止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 (五)开展经济合作,争取互利共赢

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是,联合国成立6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南北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国“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sup>1</sup> 发展问题因之成为中国多边外交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重返联合国后,中国参与了历届联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机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债务、资金、贸易、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讨论,但以表示原则立场为主。1978年以后,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及更深的层次参与联合国发展领域的活动,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参加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工作。至1986年,中国已经参加了联合国所有下属经济委员会发展业务机构和经济性专门机构的活动。

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主张建立公正的国际经

济新秩序,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商品交换上的不合理关系,制定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营造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强调互利合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支持建立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而举行的有关活动,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主张联合国把发展问题放在更突出、更优先的位置,使其贯穿于联合国各领域工作之中,并在机制和资源上予以保障,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发展。

1979年,联合国第34届大会通过第34/38号决议,决定发起新一轮全球经济谈判,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在能源、原材料、贸易、发展和货币金融等领域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立场相距甚远,筹备工作无法取得进展,谈判迟迟不能开始。在此情况下,墨西哥、奥地利等国倡议召开小型国际首脑会议,以推动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1981年10月,国际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上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场。

1987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等议题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该项决议在同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再次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就经济技术合作问题向联大提出提案,也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就此问题通过决议。在1988年的第43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中国又提出了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业技术合

<sup>1</sup>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作”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1988年,中国支持 77国集团的倡议,要求在 1990年召开一次特别联大,讨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振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发起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等问题。

1997年,中国与 77国集团一起共同倡议,在哥斯达黎加召开南南贸易、投资和金融大会。这是发展中国家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为加强南南合作而进行的一次新尝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表示支持南南合作。会议发表了《圣何塞声明》和《行动纲领》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与联合国的双边合作方面,1978年以前,中国采取“只予不取”的政策,只向联合国提供捐款,而不接受联合国方面的援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系统的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等纷纷与中国开展各种合作项目,向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资金、技术和实物援助。中国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建立起合作关系,接受其贷款。联合国在中国开展的援助项目涉及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节能环保、文教卫生、医疗保健、计划生育、防灾救灾等众多领域,对于促进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六)呼吁人权对话,倡导相互尊重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从超脱到试探性参与、从被迫应战到主动倡导对话与合作,展示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积极与开放的态度。

冷战期间,人权被笼罩上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东西方两大集团斗争和相互攻讦的工具。人权问题成为联合国议程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无意介入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在许多问题上采取超脱立场。中国也没有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仅参与了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发言的重点是谴责大规模侵犯人权问题。

1978以后,中国在联合国人权讲坛上更加活跃。1979年,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人权委员会。1981年,中国当选为经社理事会下辖的人权委员会成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人权领域活动的参与

不断加深。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国际文书的讨论和起草工作,包括《儿童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宣言》《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个人、团体或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世界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等。

中国对于签署和加入人权国际公约采取了积极、认真、慎重的态度。1980~1987年,中国共签署、批准或加入了十项人权国际公约。1989年以后,中国加入了更多的人权公约,特别是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消失,西方国家将人权斗争的矛头转向中国。在 1990年初举行的第 4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草案。1990~2004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 11次在人权委员会上提出涉华提案,但无一获得通过。

随着中国局势的稳定发展,涉华提案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1997年,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宣布,不再参与人权委员会涉华提案的共同提案,美国日趋孤立。2005年,出席第 61届人权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不在本次会议上搞反华提案。对此,中国代表团团长长沙祖康大使说,这是件好事,避免了中美在人权会议上的对抗。在美国放弃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愿与美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共同解决各自在对方人权问题上的关切。<sup>1</sup>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人权状况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愿意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中国认为,在人权国际保护活动中,应防止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要求别人。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应从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纵向进行观察。在国际社会保

<sup>1</sup> 《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 3月 18日第 3版。

护和促进人权的努力中,必须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应摒弃政治化的倾向,维护人权的普遍性、客观性、公正性和非选择性,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向别国施加政治压力。

中国主张联合国应当成为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场所,应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探索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途径。“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sup>1</sup> 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宗教、文化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甚至分歧是正常现象。各国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妥善处理分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与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了 70 余次人权对话与交流。中国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决定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和促进各项人权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

1998 年 12 月,《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50 周年之际,中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会议发了贺信,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信中有道:《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对于指导国际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贡献,就是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人权理想的追求”。<sup>2</sup>

### 三 中国多边外交政策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及其与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具有以下特点:

#### (一) 支持联合国

“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专门机构,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sup>3</sup>

联合国成立 60 多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联合国需要进行改革,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中国认为,联合国的改革是必要的。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目的是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其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会员国团结。改革应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利于维护成员国的主权,有助于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有益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均衡、健康、持续的发展。

改革不只是少数大国、强国和富国的事。它涉及各国利益,应体现出民主、公正、客观合理、平衡有效的原则,认真听取所有成员国的意见,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只有这样,改革的方案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能做到的,应立即做起来。有难度的,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实事求是,逐步解决。

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安理会的工作方式应该进行必要、适当的改进,使非安理会成员、地区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合理意见得到充分反映。改革必须维护安理会的权威,提高安理会效率,改进安理会决策,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扩大安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参与安理会决策。

#### (二) 遵守国际规则

中国不断向世界表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是规则制定与遵守者,而不是违反者。在联合国里,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例如,在能源、资源与环保等方面,中国参与了《联

<sup>1</sup>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 2000 年 9 月 6 日电。

<sup>2</sup> 《人民日报》,1998 年 12 月 11 日第 1 版。

<sup>3</sup>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 年 9 月 16 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5015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501569.htm)。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起草和讨论。公约通过后,中国即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中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强全球能源对话与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中国外长杨洁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适应问题专题会上说:“中国将根据公约和议定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做出更大贡献。”<sup>1</sup>

在安全领域,中国对于提高透明度、增加相互信任采取了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中国根据自己加入的国际公约,按时向有关机构提交报告。1991年,中国发表了第一部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白皮书,就一些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截至 2008年 7月,中国已发表了 57部白皮书,这些问题涉及民主政治建设、政党制度、人权状况、军控、国防、防扩散、宗教问题、人口问题、能源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食品安全以及西藏问题等。

2007年 8月,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并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向联合国裁军部负责人提交了《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表》以及《2006年中国常规武器转让情况表》。联合国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将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予以反映。

### (三)更加重视多边外交

历史证明,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协调行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机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的功劳不可抹杀。联合国在促进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维护人权、制定国际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更加务实,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继续加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同时,日益重视以联合国为主的多边外交。中国主要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江泽民、李鹏、

胡锦涛、温家宝等)均出席过联合国的会议,足以说明中国最高领导对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态度更加积极,参与的范围日益广泛,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日臻成熟,已经发展成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信赖的重要支持者,也是中国展现自身国际形象的国际舞台。在 2005年联合国成立 60周年纪念日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唐家璇谈到:“联合国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sup>2</sup>

中国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 1/5的大国,中国无疑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了中国的存在,联合国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具备一定能力,愿意为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 2005年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将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 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和培养各类人才等多项措施。

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也深受中国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改革开放 30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当今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可以期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增加,中国必将在国际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人类共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8-07-21]

[修回日期:2008-09-26]

[责任编辑:谭秀英]

<sup>1</sup> 杨洁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2007年 9月 24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网站, <http://www.china-un.org/chn/khly/ld62/t366296.htm>。

<sup>2</sup> 唐家璇:《在“中国与联合国”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05年 10月 24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lt/zyjh/t218077.ht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Linkage A Study of China's Globalization(1978–2008)****Su Changhe** (24)

The local-global link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affecting Chinese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article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ory into a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lobal linkage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t analyzes how the three facto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en policy change, 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contribute to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reduc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accordingly maintains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pparent protectionism among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en parallel with loc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ill produce more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ffairs in diplomacy.

**China's Foreign Aid and 30 years of Reform****Zhou Hong** (33)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78 marked a turning point to many walks of lives in China, including China's foreign aid. As the essence of China's foreign aid is to realize strategic goals through complicated economic works, the market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life is necessarily reflected in the policies, contents, methods and managerial systems of Chinese ai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adjustment in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and aid delivery mechanisms prove to be an on-going process. Follow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foreign aid shall be further developed.

**China's Reform and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Pang Sen** (44)

Since 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hina has made fundamental adjustments to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policies.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witnessed tremendous changes, covering almost all area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k.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nges of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trategic shift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Building and Armed forces Development****Yang Yi** (52)

There has been remarkable progress made in China's defense building and armed forces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ast 30 years. It was shifted from building fast response capabilities on the edge of war state to enhanc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by taking modernization as the central task in peacetime. The PLA's operation doctrine, weapons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the qualities of officers and servicemen have achieved a big leap-forward, and the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war fighting capacity improved dramatically. The PLA ha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also provided strategic security support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armed forces of a rising power, PLA is actively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activities, making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pea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